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经验研究

1989–2002

SHISANJIE SIZHONG QUANHUI YILAI
MAKASI ZHUYI ZHONGGUOHUA DE XINFAZHAN
JI JINGYAN YANJIU

◎ 袁玲儿 孙伟儿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08MLZB009YB）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经验研究

（1989—2002）

袁玲儿　孙伟儿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经验研究:1989～2002/袁玲儿,孙伟儿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308-08709-4

Ⅰ.①十… Ⅱ.①袁… ②孙… Ⅲ.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1989～2002 Ⅳ.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2276 号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经验研究
袁玲儿　孙伟儿　著

责任编辑　石国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星云光电图文制作工作室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62 千字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709-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言……（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轨迹……（6）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6）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9）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14）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 ……（18）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生 ……（2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24）
一、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 ……（24）
二、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 ……（31）
三、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挑战 ……（45）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53）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研究的开展 ……（53）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对邓小平理论的新概括 ……（6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75）

第四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理论创新……（81）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发展 ……（81）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 ……（89）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飞跃 ……（112）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及发展……（116）
一、最高命题的新阐释 ……（116）
二、“三个组成部分”的新发展 ……（125）
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新揭示 ……（137）

第六章 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及发展…… (143)
一、社会主义阶段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143)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148)
三、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及其规律 …… (156)

第七章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的深化及发展…… (167)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全面总结 …… (167)
二、先进性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永恒主题 …… (177)
三、执政能力建设是执好政的必然要求 …… (181)
四、党风廉政建设是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 …… (184)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191)
一、准确把握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 …… (191)
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 (195)
三、建设高素质的理论队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靠保障 …… (200)
四、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
…… (203)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1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　言

1989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①]当前特别要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②]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从那时起到党的十六大，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即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党的十五大、党的十六大为界限构成的三个时期。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阐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在新的条件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重要的理论文献有：江泽民在建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班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在建党七十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南方谈话;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这些重要文献中,提出了“两个不动摇”的观点,即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完整的阐述,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重要的理论文献有: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制定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3 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以及中央的决定、江泽民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这些重要文献中,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若干具有突破性的新观点,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观点,等等。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六大。“十五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开拓创新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五年。”[①]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全党同志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学习,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研究、宣传和教育,并最终确定其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重要理论文献为: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2000 年初江泽民南方视察时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2001 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与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这些文献中,中国共产党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确立其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十三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本著作从八个方面叙述和研究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广大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9 页。

国化的新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及取得的主要经验。

十三届四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对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是党的十六大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要的发展步骤。所以系统研究和叙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深刻和全面理解十三届四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著作全面而简要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做了研究和叙述,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概念的理解进行了阐述,而且将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五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和恢复,并对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所取得的成果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探讨。

十三届四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基于这个主题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学技术信息化,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个潮流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的当然之举;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进步和发展,社会随之出现巨大转型,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符合时代的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和解决新问题的必然之举;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马克思主义却不能丢,它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邓小平理论本身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萌芽大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这个时期,其始点大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在十二大和十三大期间形成。但是,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及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却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之间由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本著作对十三届四中全会前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作了叙述,对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概括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进行了叙述,对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意义作了叙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完整过程以及十三届四

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贡献。

沿着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走下去，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必然要触及到许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也必须反映在社会主义制度主体上，即它的建立和建设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上。因此，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断解答，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而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重大问题。本著作的这部分主要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核心内容进行了叙述和研究，并着重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对邓小平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以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的一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态度，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效和出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有较大的发展，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认识的转化和态度的科学。这个时期，全党同志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高命题，从新的角度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个设想，他们要求后人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道路。但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仍然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即根据理论而不是现实来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在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提出了原则性思路。在这个基础上，十三届四中全全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细致的描述，社会主义本质得以提炼，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更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定性，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得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在全党同志的努力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事业进行得如何说到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领导这项事业，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极高的执政能力和其先进性的持续保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及执政理论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对执政

党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深刻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得出中国共产党三大转变的重要结论,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以人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意识和执政理念,提出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和具体举措,并且深入开展了这三大建设,从而使党在现代化的转变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有效的巩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十三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是中国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理论队伍是中国化的可靠依据;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根本目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剧烈的变革。系统总结这个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和创新逻辑,寻找其成功之道以及规律性,对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同时也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曲折坎坷中创立了一座辉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大厦。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随着其强势的经济和政治一起来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开始选择性地将西方思想文化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状态下进行修正和改变，使其成为一种能够与中华民族文化统一起来的新的思想文化。

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进行结合，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1919 年 8 月，李大钊在与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时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 1920 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② 对此，江泽民评价道：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最基本的经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由李大钊同志初步提示的”。③ 与时同时，陈独秀也提出类似思想观点，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而“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由此他呼吁“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

① 李大钊文集编辑组编：《李大钊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② 李大钊文集编辑组编：《李大钊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③ 江泽民在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 年 9 月 27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所以，马克思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①]这里虽然没有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但实际上已经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际上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把党成立后的“第一任务”确定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及努力，中国共产党二大才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5月，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竟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但我们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产业的情况和文化的程度”，完全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③] 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④]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极好的实验场所。在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两个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方面是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情况，得出相关的理论。如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等文章，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农民与国民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明确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则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问题以及革命对象、动力和同盟军的问题。1926年下半年和1927年初，毛泽东还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之关系》、《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文，对农民的收入、财产、家庭、日常生活、政治态度和心理都

---

① 三联书店编辑部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178页。

② 《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③ 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15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们的这些成果,是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再一个方面是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更为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瞿秋白指出:“理论的真确与否,对于革命的实际运动非常之重要;理论若与实际相结合,他自身也就成为革命运动里的一种很大的实际力量。”①他还说:“理论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综合。当然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了空谈。然而实行革命运动而没有理论,也就要变成盲目的妄动,不相适应,绝无全盘规划的行动而已。”②“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③这是党内最早的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提法。

经过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棵大树的枝芽已经深深地播种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但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并不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在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党的主要领导人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和军事工作,以至于当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和进步群众举起屠刀时,中国共产党竟无力反抗,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国民革命运动失败。

就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国民运动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界也开始探讨在中国推进西方文化教育之路,并且使用了中国化一词。192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其中说道:“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1924 年,《中华教育界》第 8 期上发表了舒新城的《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的信,文中说:“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927 年,庄泽宣在其著作《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中国国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我以为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

① 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84 页。
② 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83 页。
③ 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民族的特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虽然文中所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回事,但毕竟也是对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推行的一种探讨,而且还明确提出“中国化”这个概念。瞿秋白曾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①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国民革命失败后,新军阀展开争夺势力的战争,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继续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探索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从而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这一真理。1930 年 5 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 这个思想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地靠近了一大步。但是,毛泽东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行为仍然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相反党内的教条主义则大行其道,他们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结论,将苏联经验奉为神明,错误地估计革命的形势,大力推行“极左”的政策,打击和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思想,将中国革命一步步推向绝境。1934 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再次遭遇严重挫折。

1935 年 1 月,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遵义会议后,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的崇高威望,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以及和周恩来、王稼祥的关系,使他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实际上取得了对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指挥权。随后,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于 1935 年 10 月 19 日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11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

---

① 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 年第 5 期,第 73—7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112 页。

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1936 年 10 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为适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新形势,从组织上保障红军的统一指挥,12 月 7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中央军委由 23 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至此,毛泽东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职务上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者。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条件。1936 年和 1937 年,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从思想方法上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阐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实践的开展创造了基本的思想条件。

当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艰辛探索的时候,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社会环境,催化了知识界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将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民主和辩证法中国化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为挽救国难,一些知识分子发起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新文化运动”,称之为“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初衷是批判日本侵略者、汉奸对传统道德的消极利用以及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的尊孔复古的保守文化政策,后来的发展则是要积极主动地用批判的精神把中国固有的东西从侵略者那里接过来,并赋予其积极的意义。新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在倡导文化之民族性的基础上,比较广泛地运用了“中国化”概念。1936 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主张。他说,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① 1937 年,张申府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指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算数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②1938 年 4 月 1 日,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③1938 年 7 月,陈伯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上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理论没有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因此,要“使唯物辩证法

① 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新东方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7 页。

②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 1939 年版,第 89 页。

③ 艾思奇文集编辑组编:《艾思奇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7 页。

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①] 国外学者雷蒙德·怀利认为，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指向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②]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落脚后，尽管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已经巩固，但共产国际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影响。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对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批评，指责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及民生问题，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现，所以他的话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同时，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俨然是“第二中央”，其任意发号施令，削弱了毛泽东在组织上的权力。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一度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有一次，李维汉去看毛泽东，毛泽东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③] 王明的干扰，不仅影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而且也破坏了党内的思想统一，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着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使其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和思想问题。1938 年 9 月，王稼祥回国，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传达。王稼祥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国党的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④]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共中央纠正王明右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

---

① 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 4 卷，1936 年 9 月。

② [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 年 6 期，第 60 页。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43 页。

④ 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8、141 页。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6 页。

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相呼应,张闻天在会上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认识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②

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正式提出,而且为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同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成为全党同志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全面展开。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表现,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后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再次解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与相统一。刘少奇也有一个说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③

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适合中国的情况,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绝不能照抄照搬。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 年 10 月和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分别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将马克思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8—659 页。

②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5—22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5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